

第一章

驶向北大荒

往年，哈尔滨的初冬并不那么冷。晶莹剔透的雪花纷纷扬扬，嬉笑着摸你的鼻子，挠你的脸，凉凉的、冰冰的、痒痒的，若是用手一抓，它同你玩起了捉迷藏，不见了，变作了小水滴。房檐上倒挂着的冰溜子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参差不齐，如同一把把形状各异的锋利巨锥，直指大地。房子白了，像神话里让人遐思的小木屋；树木白了，似仙境里圣洁的玉树琼枝；地上白了，仿佛铺展着接天连壤的银色地毯。银色的世界里，绽开笑脸儿的孩子们在炫目的日光下打雪仗、堆雪人、踩脚印，玩得天翻地覆。

1968年的初冬不知咋的了，天嘎嘎冷，老天爷还总板着脸，几天不开晴，整个城市上空仿佛罩上了灰色的暗纱，让人压抑得喘不上气来。

11月21日这天下午，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吵吵嚷嚷。披挂着艳丽彩条、佩戴着一朵大红花的蒸汽机车头趾高气扬地鸣笛欢叫着，好像骄傲地告诉人们，它要去完成一项伟大使命，要把这些“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十七八岁的中学生送到祖国的边陲，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一趟向北开往嫩江县的专列，装载着去往嫩北农场的知青们。

十七岁的刘学军趑趄趑趄扛着行囊，气喘吁吁地挤向指定的车厢，眼睛还不时地寻找着自己的同学。哥哥和姐夫抬着昨晚才打完、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透、上面横七竖八地捆绑着草绳的大木箱紧跟在刘学军后

边，生怕人多被挤散了。上了火车，刘学军已大汗淋漓，刚走进车厢就听有人喊：“哎！学军，我们在这儿！”

先刘学军一步上车的同班同学姜向东和他打着招呼，并从过道挤过去，帮助刘学军的哥哥和姐夫把大木箱放在车门对面不开启的车门旁。

“哥、姐夫，你们下车吧，火车快开了！”刘军学说。

“嗯，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姐夫说。

“到那儿就往家写封信，免得爸妈惦记。”哥哥说。

“我知道了，你们下车吧。”

.....

站台上，送关英男、关英强哥俩的亲友们一脸的凝重。关英男背着一个褐黄色的书包乐颠颠地跟在哥哥关英强的后边，仿佛要去参加什么重大的节日，笑逐颜开的。

此时，关英男的父亲与送站的叶森的父亲不期相遇，他们是老朋友，多年不见，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关英男哥俩与叶森相识了。

关英男上中学念了还不到一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毛主席语录》。按规定关英男不属于下乡之列，可他已感到上山下乡的“革命风暴”规模之大，气势之猛。看来下乡是必由之路，既然早晚都是个走，莫不如和哥哥一起下乡，互相还有个照应，他就自作主张报了名。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得知他报名下乡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哈尔滨，他重重打了大儿子关英强一记耳光，而后蹲在地上哭起来：自己就两个儿子，咋说走就都走了呢？再说关英男才十五岁，你当哥哥的应阻止他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父亲泪如泉涌。他真后悔：后悔不该在这特殊时期去外地工作；后悔自己晚回来一步，没能阻止老儿子下乡；更后悔自己不该打大儿子。老儿子犟，说咋的就咋的，谁也挡不住，咋能怪罪大儿

子呢？唉！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韩晓萍背着妈妈给她买的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的草绿色书包，在父母、亲友的簇拥下，满脸的焦急，还没等爸妈多嘱咐几句就赶紧挤进了车厢，生怕车开了把自己落下。

下午一点十分，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启动了，当火车开启的刹那，车上下哭声一片。关英男很是诧异：这是干啥呀，不就是离开家了嘛，至于这样吗？他光顾着看热闹，眼睛也不够使了，见好多人追着火车，还觉得挺有意思，哪里还能注意到站台上攒动中的父母身影呀。

关英男有个要好的同学，在关英男下乡之前就跟着哥哥下乡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关英男专程把他送到兵团，还在那小住了几日，觉得兵团挺好的，天天吃馒头，菜里还有肉，比城里吃得好多了。他认为兵团与农场也差不了啥，下乡对他来说并非不好，所以火车开动了，他不以为然。

送行的人紧跟着徐徐开动的列车如潮水般随之涌动。车厢内的知青有的趴在车窗口和亲人摆手依依惜别，有的紧紧拉着家人的手不放，有的索性抽泣起来。

这时，站上一位中年妇女声嘶力竭地号哭起来，声音好大好大，盖住了送行人们的暗暗哭泣，盖住了声声叮嘱的话语，盖住了火车拉响了的汽笛声，盖住了站台里的一切声息……那悲痛、那凄惨、那叫喊像是死了人，搅得车厢内外一片号啕声。

火车速度加快了，一些送行的人随着火车跑了起来，车上的刘学军和车下的哥哥、姐夫一直相互摆着手，直至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野里。

韩晓萍上了火车一看周围都是陌生人，心里有些害怕，越害怕越紧张，就紧搂着怀里的书包生怕丢失。其实书包里除了父母带给她路上吃

的几张糖饼和二十块钱生活费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傻乎乎地坐在座位上，定下神来往窗外一看，火车已过了松花江大桥，视野里一片荒凉，她这才回过味来，抱着书包呜呜哭起来。坐在一旁的贺建生说：“哎呀！你咋才想起来哭呢？！”

韩晓萍经常去一位亲戚家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女孩，她是通过这位女孩在其所就读的中学报名去嫩北农场的，所以车厢里每张面孔她都很陌生，心里便生发了几丝胆怯。

刚才还十分淡定的董立明，望着渐渐远去的松花江大桥，心情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听到车厢里韩晓萍的哭声时，他眼圈湿润了。

刘学军心里有着些许的酸楚，但并不像有些人表现得那么强烈，他觉得下乡只不过是去另一个地方工作几年，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二

1966年的秋天，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刘学军兴奋无比，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有见到毛主席的一天啊。

十一刚过，不知他从哪听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能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日思夜想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他欣喜若狂，想把自己去北京的想法告诉妈妈，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就怕自己没出过门，妈妈不放心而阻止他。

那天，他鼓起勇气把想法和妈妈说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妈妈爽快地答应了，还积极地为她筹钱。按妈妈的说法：都十五岁了，该闯荡闯荡了。

刘学军高兴极了，立刻找来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同学田宾，二人一拍

即合，田宾又叫上了另一个班的朋友谢雨。他们戴着“红卫兵”袖标，坐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

说是坐火车，倒不如说是“站”火车，有时甚至只能一只脚着地的“金鸡独立”。车厢的行李架上、座位上、座位下、中间过道、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就连窄窄的座位靠背上都斜躺着人。要是有个内急，男同学还好些，女同学可就麻烦大了，她们不敢吃、不敢喝，饿了、渴了都挺着。火车说停就停，说开就开，有人想下去方便一下，门是出不去了，只好从窗户往外爬，可还没等上来火车就开了。

火车一到站就是一场“战斗”。由于车厢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站台上想上车的人就拥向车窗。为避免车厢更加拥挤，车厢里的人提前把车窗关得紧紧，使劲地摁着不让车窗外的人上车。车下的人使用坚硬的东西又启又撬，人踩着人往车窗里爬，直到火车开动，这场“战斗”才偃旗息鼓。

沿着火车线徒步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比比皆是，一队接一队。他们打着各省市红卫兵战斗队的旗帜，甩开步子，高昂着头向着北京挺进，以示对毛主席的忠心。

刘学军他们到了北京正赶上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10月18日这天，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刘学军他们看见了，看见了毛主席神采奕奕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置身于人海之中的他们，在城楼下挥动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同红卫兵们一道跳跃着、欢呼着、亢奋着，有节奏、有韵律、有激情地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嘴喊干了，嗓子喊哑了，腿跳累了也表达不尽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无比敬仰。整个天安门广场群情振奋、激浪拍空，红卫兵手中挥舞的红宝书顷刻间成了红色的海洋。

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刘学军他们又去了清华、北大抄大字报，之后

坐上火车打道回府了。火车快开到天津时，就听车上的人说，只要有学生证，到全国各地哪儿串联都行，吃住行全免费。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的恩赐，应把握住这机会，于是他们三人在天津下了火车。火车站到处是带着红袖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出站口还设置多处红卫兵接待站，专门负责安排外地红卫兵吃住行的一些事宜。

天津的经历使他们的心野了。他们知道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的地方，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夜上海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根据张乐平同名漫画改编，1949年出品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就是以上海为大背景，在他们童稚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印迹，他们真渴望到上海走一遭，看看现在的新上海、新风貌。三人不谋而合，于是又坐上了开往上海运货物的“闷罐车”。这列为解决大串联运力不足而加开的“闷罐车”敞开的大门用一根大木杠横着，车厢两侧的角落一边是男厕所，另一边是女厕所。所谓的厕所就是围起的草席里面各放着几只大木桶，木桶没有任何东西遮盖，粪污溢出，桶里的粪便在发酵，刺鼻的臭味弥漫在空气中让人作呕。他们挤坐在里面，汗水直流。

这时谢雨突然发现自己的钱丢了，急得直哭。刘学军见状，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跟着干着急，不知怎样是好。

片刻，他扭过脸轻声地对谢雨说：“别哭了，已经都丢了，找又找不回来，哭有什么用？反正咱们也用不着咋花钱。”

“那可不咋的，吃住行咱都不掏钱，除了这三样咱没有花钱的地方。”田宾说。

“就是呀！没事的，再说还有我们，我们还有钱啊，够花了。”刘学军接着说。

其实刘学军和田宾身上所带的钱也不多，离家时妈妈给刘学军凑了

十四元，田宾妈给了田宾十五元，离家这么长时间，他们省吃俭用，计划着花。

火车快到苏州时，玩野了的刘学军建议在苏州下车，看看苏州的美景。他从小就听妈妈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谢雨因为钱丢了不想下车，非要到上海就返回哈尔滨不可，不管刘学军、田宾咋劝他都不听，田宾没了主意。刘学军执意要下车，而且态度坚决地对田宾说：“都说苏州非常美，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你下不下？你不下我可下了！”说着就往车门口挤，挤了半天才到车门口，火车一停，刘学军纵身从拥挤的车门口跳了下去，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发现田宾也挤到了车门口。火车鸣着长笛缓缓开动了，刘学军抬头冲着站在车门口犹豫的田宾喊：“田宾，你再不下来以后真就没机会了！”别说，这句话挺管用，田宾拼命地分开人群，纵身跳了下来。

苏州因古典园林妩媚多姿，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称。虽说两人坐车吃了不少苦，可到了“东方的威尼斯”，参观了富有诗意的小桥、流水和狮子林、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等古典园林，感到美不胜收。

离家多日，刘学军怕爸妈惦记，到了晚上，他把信纸铺在床上（所谓的床便是工厂大仓库地面铺就的草席），趴在那里开始给家写信。这是他离开家十余天里第一次给家写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离开家已经十多天了，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我见到毛主席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神采奕奕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向我们红卫兵招手呢！我们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后从北京出发去了天津，现在又来到了美丽的苏州。全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所到之处都在造反，都在闹革命。我还和田宾参观了很多大学，抄了不少大字报，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将把这里的革命经验带回学校去，决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红卫兵的希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爸妈你们放心，我挺好的。过两天我和田宾还要到上海去，在上海待几天就回家。

致以革命的战斗敬礼！

儿子：小军

1966年10月30日

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的刘学军写完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有写过信的他感到很满意，第二天，他买了一张四分钱的邮票贴上，把信寄走了。

之后，他与田宾又去了上海、井冈山、韶山等地“取经”。在井冈山他们参观了茨坪、黄洋界等革命圣地，刘学军还用一枚毛主席像章换了一根井冈山的扁担，并请当年的老红军战士题字。老红军用毛笔在他的扁担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继红军志挑革命担”八个大字。在韶山，他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买了一顶毛主席家乡的斗笠戴在了头上。他俩风风火火、开开心心，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大专院校抄写大字报，一本又大又厚的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被刘学军抄写得密密麻麻。

从韶山经北京回到哈尔滨已是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此时天刚蒙蒙亮，北国冰城天寒地冻，离家时穿的秋装已遮不住飕飕刺骨的凛冽寒风。

他俩拿着两样珍贵的纪念品——扁担、斗笠，疾步踏上了有轨电车，

售票员让他们买票。虽说票价才四分钱，可兜里仅剩的几角钱他们还真舍不得往外掏。

“我们是红卫兵，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红卫兵大串联到全国各地都免费，怎么回到了家乡还管我们要钱？！”刘学军歪着头理直气壮地瞅着售票员。

售票员是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同志，听刘学军这么一说，她不仅没生气，反而笑了：“既然你们是红卫兵那就不用买票了，欢迎串联归来的红卫兵小将！”说完就到车的另一侧售票去了。

下了车，刘学军、田宾他俩一溜小跑到了大院，自顾自地往家跑。刘学军到了家门口看见窗户上还挂着窗帘，知道家人还没起床，便“咣咣”地敲着房门。

“谁呀？”屋里传出妈妈的声音。

“妈，我是小军！”刘学军在门外大声说。妈妈披着棉袄打开房门。

“妈——！”

“小军——！”妈妈泪水如泉，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惊喜与激动的她半天才说出话来：“儿子，你咋才回来呀？走这么长时间，可把妈急坏了，快让妈看看，瞧你瘦了一圈。”妈妈爱怜地打量着儿子。

“孩子穿得太少，别让他冻着，赶紧进屋。”站在一旁的爸爸眼里闪着泪花催促着。

“有人说哪哪撞车了、哪哪火车出轨了、哪哪翻船了，我和你爸这颗心老是提着，就怕你有个好歹的，这回好了，你回来了，我们悬着的这颗心总算落地了……”妈妈流着泪爱抚地絮叨着。

三

一列火车忽地从对面驶过，把刘学军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

细想来，大家在一起到农场锻炼锻炼有什么不好？“见过世面”的刘学军这么想。可刚才那送站的场景确实使他另有一番滋味，这毕竟和大串联有所不同。庆幸的是爸妈没来送他，爸妈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然会禁不住的。

刘学军在家是最小的，母亲四十岁时生的他。不是爸妈不送他，而是这几天给他张罗下乡的物品，加之老儿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急火攻心，双双病倒了。

刘学军刚上中学时是在一处条件很差的校舍度过的，教室为半地下的地窖子，学生们整天在那又湿又潮、光线昏暗的教室里学习，许多同学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刘学军也没逃脱厄运，严重的风湿病把他折磨得痛苦至极，就连脚下的一粒小石子都会把他硌倒，是同学轮流搀扶他上下学他才没能缺课。后来，学校搬到了阳光明媚、位于松花江边的新校舍，刘学军的风湿病才慢慢地有了好转。

在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学校恢复了文化课，可好景不长，“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这一运动波澜壮阔，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大潮中。这能不让爸妈着急吗？为不让刘学军下乡，爸妈商量让他去山东老家躲一躲，可刘学军说啥都不干。

家在动力区的三姐住的是平房，欲要垒个大院墙，再盖一间偏房，想让刘学军去帮忙。爸妈想：虽说小军这孩子是家里的老小，从没干过重活，又得过风湿病，但三姑娘两口子都有工作，孩子还很小，这个忙咋说也得帮啊。再说这也是躲避下乡的好机会，免得总有同学来撺掇他。爸妈便满口答应下来。

刘学军来到三姐家每天起早贪黑地挑水、和泥、脱坯、垒院墙、盖偏房。他天不亮就起床，每天要和一手推车的泥，和好的泥很重，要把它一锹

锹地放入坯模中，用手抹平后晾晒。一块泥坯有二十斤重。倘若赶上阴天下雨，还得迅速把泥坯码起来、盖好，他整天累得腰酸腿胀。

尽管远离了学校和同学，但他的心一直没有平静，总想知道“上山下乡”的近况，于是他起早贪黑，加快了干活速度。年仅十七岁的他一千就是三个月，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偏房和一人多高的大院墙终于平地而起。

刘学军从三姐家干完活回来，妈妈看到双手布满老茧、脸晒得漆黑的儿子很是心疼，但她也为没人来掙掙儿子下乡而感到庆幸。

刘学军回来后就去找同班同学姜向东打听情况。姜向东告诉他同学们几乎全报名去嫩北农场了，如再不走以后只能插队去农村，劝他结伴同行。刘学军分析了形势，决心下乡，可刘学军妈说什么都不同意。刘学军就与母亲软磨硬泡，最后“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然而，刘学军几次起夜常见母亲坐在床边擦着眼泪。

火车鸣着长笛，吐着长烟，风驰电掣。

车厢内一位女生大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抽噎着说：“我要下车，我要回家！”

“别哭了，眼睛都哭肿了！”一位清瘦的男生声音不大地对她说。可她还是哭声不止，惹得旁边几位女孩也捂着脸抽抽搭搭。

“你看，别人都看着你呢，多不好。”男生接着说。

“有啥不好的，我咋的了，不就是想下车回家吗？”她边哭边委屈地反驳。

“这是火车，不是摩电（有轨电车），说下车就下车呀？行了，别哭了，这车上谁像你，从上车就开始哭，你要是再哭，我真不管了！”男生说得软中带硬。女生这才渐渐地停止了哭声。

别人以为他俩是兄妹，其实不然，男生叫许春雷，哭鼻子的女生叫程玉芬，他们同住一个大院。程玉芬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带着六个孩子艰辛度日，她排行老四，是个心直口快、能干，且爱耍小性子的姑娘。程玉芬妈知道自己姑娘的脾气秉性，临下乡前一再叮嘱许春雷要照顾她。

哭够了，哭累了，坐在那里的程玉芬像秋天大地里霜打的茄子，蔫了。

“哎，咱们玩扑克呀？”

“打啥的？”

“抽王八。”

“没意思。斗地主吧！”

不知是想驱散不悦的心绪，还是想调解车内压抑的气氛，叶森招呼刘学军、贺建生和姜向东凑到了一块斗起了“地主”。

冬天天短，天黑得早，疲惫一天的知青们东倒西歪地进入了梦乡。

刘学军不知怎么就是睡不着，越睡不着，那火车车轮“演奏”的哐当当的“打击乐变奏曲”越是震耳欲聋。

“哐当当——哐当当——”一会儿火车不知驶进了什么车站，好像换轨道了，车厢摇晃起来，车厢之间的门也随之“嘭”的一声关上。一会儿又“空哐哐——空哐哐——”变了调子。这声音让他感到烦躁，这烦躁化作了郁闷把心中填满！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以及车厢连接处发出的声音搅得他心情一片糟。听烦了、坐腻了索性站起来；站累了、腿酸了再坐下，来回地折腾着。微露的晨曦洒进了车厢，他仍没有一丝困意，隔窗而望，披挂彩带的火车头甩了一个大弯儿，吐着长长的白烟，拖着一节节车厢，“哐当当——哐当当——”不知疲劳地向前奔跑。

呜——汽笛长鸣，火车疾驰。

窗外已清晰明朗，白雪茫茫无尽头，凝望着这“千里冰封”、人烟稀少的景象，刘学军知道越往北走越冷、越荒凉，心里感到了一种沉闷

与压抑，来时的那种幼稚般的冲动没有了。

知青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洗漱、整理行囊，车厢里开始骚动起来。

火车经一夜的奔波，清晨时分，在慢速滑动几分钟后，伴随着一阵车身的震颤戛然而止。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嫩江县火车站。随着车门的打开，冷清的站台顿时沸腾起来，嘈杂声、哨子声、叫喊声响成了一片。

站台上没有迎接的人群和欢迎仪式，只有几位农场派来的接站人拿着大喇叭，吹着哨子高声宣读人员分配去向名单。刘学军、姜向东等几个同班同学被分到了嫩北农场的“五七干校”，还有在火车上相识的贺建生、许春雷、程玉芬、叶森等。

车站外，几十辆大卡车横七竖八地泊在那里，刘学军他们穿过拥挤的人流，找到了几辆贴有“五七干校”字样的大卡车。卡车车厢到处粘着牲畜的绒毛和没有扫净的泥土及牲畜粪便的残渣。这群稚气未脱的知青们无暇顾及四周的景物，依次爬上了卡车。

嫩北农场地处嫩江县以北约五十公里的松嫩平原北端，与小兴安岭相连，占地六百多平方公里。十一月下旬的嫩北农场大地被白雪覆盖着，茫茫空寂，寥落凄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大荒”。

卡车载着年轻的一代在沙石路上飞驰，昨日的离别与惆怅似乎随着城市的远去而悄然飞逝，大家挤在卡车的车厢里开始找着话题。

卡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嫩北农场的场部，也没停息便驶入了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道路凹凸不平，车子颠簸得厉害，车厢里的人就像簸箕里的豆粒被颠来颠去，颠得五脏六腑都要错了位，肚子丝丝地作疼，一句话还没等说完就被颠得噎了回去。

车轮驶在积雪较少的路段便掀起一片尘浪，车上的知青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嘴里很牙碜。于是，大家紧闭着嘴巴不说话了，盼望着早点到

达住所。

卡车在山坡上转了一个弯儿下得坡来，一栋栋散落的泥坯平房展现在眼前，这就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五七干校”。还没等下车，早已在那里等待的三十多名小学生们手里舞动着五颜六色的纸制小彩旗不停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是干校的小学校长裴有才受领导的指派，带领学生前来迎接知青们的。

一阵热烈欢迎过后，知青们各自来到了宿舍。

男宿舍是由土坯砌墙、茅草苫顶的泥坯房，长约五十米，中间被拦成两段便成了两间男生宿舍，左面那间能住二十多人，右边那间能住三十多人。房子中间齐腰高的一条取暖火龙通向房子的尽头，火龙的两侧是新搭的火炕。

屋子很潮湿，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霉气和一股难闻的马粪味，后来才知道“五七干校”一下子要来这么多知识青年，让干校领导措手不及，就把坡上养马的马舍间辟出来给男生做宿舍，女生宿舍是在场区西北角的丁字房。丁字房原来是单身“二劳改”（刑满释放的就业农工）居住的大宿舍，知青来之前他们便被遣散到各地，现在成了女知青的栖身之地。

没人指点，更没人安排知青们如何入住，他们各自往屋里搬着行李，抢占自己喜欢的铺位。贺建生等四个同班同学把一头占了四个位置，最后一个行李还没等放好，另一个班的朱成勇等人就挨着贺建生他们的行李挤了进去，把贺建生他们的行李挤没了一个空。贺建生让他们串串，他们说什么也不串。贺建生不听邪，上去把挨着他们的一个行李扔到了一边，把自己的行李插了进去。

“干什么扔我们行李？想打仗啊！”朱成勇说。

“让你们串，你们不串，我们是一起的，能差一个人吗？”两伙人争吵起来。

“哎哎哎，吵个啥劲？他们几个是一个班的，就差一个位置，换一下就得了呗，再说都是一个车来的，以后还得常在一起，算了吧。”任智远上前劝了几句，双方不言语了。

姜向东、许春雷、叶森、刘学军他们的行李挨排放在了一起，每人有一米宽的铺位。

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要在这片土地上展现，他们的生活就要在这里开始……

四

干校是嫩北农场最小的分场，场区（即行政和生活区）地处一块不大的丘陵地带，方圆也就两三里地，一条丁字路把办公区、家属区、综合区分隔开来。

这是一块马蹄状的“风水宝地”。它三面环山，只有南面通往相邻的农村柏根里大队的方向地势平坦、一望无际、一派阔朗。山做屏蔽，这里和别的分场相比，冬天的西北风就不那么强势了。

干校办公室、食堂、小学、小卖部、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位于上坡，中坡西侧建有鸡舍、羊舍、猪舍、豆腐坊，中坡东侧为家属区、机耕队等，卫生所、兽医所、马舍、牛舍等分布在下坡。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提出了广大干部要下放劳动的要求。从此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揭竿而起，一批批干部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接受锻炼，接受革命的洗礼。

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嫩北农场也准备成立“五七干校”，目的是对干部进行劳动锻炼和思想教育。有的干部打蔫了，认为“五七干校”就是对不得宠干部和知识分子“变相劳改”的场所。为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农场“五七干校”成立之前，各分场还相继召开了宣传与动员大会。

1968年9月的一天，九分场宣传与动员大会在大食堂召开。参加会议的干部们看上去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其实他们内心世界如同狂飙掀起了巨澜，心慌意乱，各自揣摩着自己是否被“下放”，一个个神情惆怅、坐立不安，会场气氛格外压抑与沉闷……

“单元德——”

坐在下面认真聆听的九分场生产连排长单元德突然听到会议主持人念自己的名字，吓得心扑腾扑腾乱跳。他坐着没动，心想：我工作挺卖力的，也没犯啥错误呀，咋还把我下放到干校劳动啊？后边的同志以为他没听着，捅了捅他。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与紧张，他佯装镇静，表现出很积极进步的样子站起身来振臂高呼：“坚决走五七道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会场上的人也都挥舞着拳头跟着他振臂高呼。口号喊完了，单元德那颗激烈跳动的心仿佛要蹦出胸膛，手凉凉的、麻麻的，身体软软的，脑袋一片空白，也不知主持人又说了些什么，还念到了谁的名字。

单元德是老知青，1964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场的，来农场第二年当上了排长。他工作认真，有头脑是大家公认的。

在各分场动员大会上被念到名的人员十月一日国庆节这天都集中到了嫩北农场场部俱乐部。场部是嫩北农场机关所在地，是全农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设有机关办公楼、职工俱乐部（兼电影院）、商店、食堂、饭店、理发店、招待所、医院、邮局、机械修配厂、粮油加工厂、中学、小学、托儿所、运动场等文化教育部门和生活服务场地与设施。

主席台上除了农场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之外，就座的还有财务科科长郑德生。单元德蔫头耷脑地跟着人流进入了会场，往那一坐，脑袋乱哄哄的，不管台上讲的啥他都不入脑。他想：反正自己完了，已注定去干校被改造了，讲别的与他一点都无关，让干啥就干啥，爱咋的就咋的吧。

“单元德到台上来——”主持人在台上喊。

单元德醒过神来，心跳加快了。他犯嘀咕，好像在喊我的名字？莫不是自己在幻听？他坐着没动。

“请单元德同志到台上来——”主持人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又一次喊到。

单元德听得真真切切，这真是叫自己呢。不过这次多了个“同志”和“请”。他带着疑惑，硬着头皮怏怏不快地走上台。

“向五七干校赠匾。”主持人说。

单元德正不知所措傻傻地站着，一听赠匾，他寻思过味了，心想：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整得我一天担惊受怕的。这回他来了精神，上前几步，向主席台人员敬了个礼，郑重地从领导手中接过了干校的牌匾，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示意他把牌匾交与台下，他刚把牌匾递给台下的人，主持人又宣布了：“向五七干校赠旗。”

单元德又郑重地接过了“五七干校”的大旗。从念到他名字那刻的惴惴不安，到接旗时的受宠若惊，他简直判若两人，脸上的阴郁、愁苦不见了，惬意、微笑溢满了脸颊。顿时，他精神了、气爽了，心也不怦怦乱蹦了，感到浑身热血沸腾，胸脯挺得老高，大有“一代天骄”之感。

单元德是干校最年轻的干部之一，他不仅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更是上级领导重点培养对象，难怪又是让他接匾，又是让他接旗的。

“五七干校”成立了，上级领导宣布“五七干校”设在畜牧场，畜牧场从此更名为“五七干校”，并任命：

革命委员会主任：郑德生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高大川

生产连指导员兼政工干事：闫国栋